

## 档案时空

都市快报与浙江省档案馆合作栏目

知往鉴今,意在未。都市快报与浙江省档案馆合作,在快报“漫阅读”周刊开设“档案时空”新栏目,梳理珍贵的馆藏档案,寻找浙江大地上的历史印记,发掘档案背后风云际会的历史事实。古人云:“抚今追昔,究论兴衰治乱之由。”视历史为包袱,则举步维艰;视历史为镜鉴,则智慧生发,耳聪目明,可观照现实,以照亮前路。

# 老校长竺可桢(上)

## 在任13年 浙大变成了“东方剑桥”

有一个人,舍弃了自己最爱的科研领域和最可能出成果的时间,把人生最饱满的十三年奉献给了大学行政事业;有一个人,带领一所大学西迁2500多公里,历经9年,却在这个过程中把这所大学办成了令国内外都刮目相看的“东方剑桥”;有一个人,为了保护故乡的珍贵文物图书,几经周折,数封书信,义正辞严与政府官员据理力争……

这个人就是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。如今,他的铜像屹立在浙江大学图书馆门口,继续用慈爱的目光看着他钟爱的莘莘学子。

浙江省档案馆馆藏的档案表明,他的大半生和浙大、和故乡紧密相连,他的爱一点一滴渗透在里面。

记者 黄莺

## 档案索引

浙江大学的前身是1897年于杭州创办的求是书院,1928年4月改称浙江大学,7月冠以“国立”两字。1936年至1949年竺可桢任校长期间,该校取得最突出的发展,奠定其成为名校的基础。竺可桢到处招贤纳士,因抗日战争爆发带领全校师生西迁到贵州、重庆等地,在西迁途中丝毫没有影响学生学业和教师科研水平,许多教授最辉煌的学术成就都在西迁途中取得,被来参观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称为“东方剑桥”。

浙江省档案馆馆藏国立浙江大学全宗档案共4394卷,起止时间为1922年至1953年。档案包括综合类的学校各类会议记录、规章、校刊等;人事类的学生名册、教职员工名录、学生调查表等;总务财会类的各种移交、接收清册;教务类的教员专题研究、学期课程总表、选送中央研究院院士等;其他类的包括蔡元培等亲笔信、学生运动材料,浙江大学“于子三事件”材料,竺可桢校长办公室的公函来往以及亲笔信等,资料非常详实。

## 教育不受党政干涉

竺可桢(1890.3.7-1974.2.7),又名绍荣,字藕舫,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(今属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东关街道)。1909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(现西南交通大学)学习土木工程,学习成绩居全班第一。1910年公费留美入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学习。1913年夏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,获得博士学位。1921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,1929年到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。

1936年初,经陈布雷力荐,蒋介石邀请竺可桢担任浙江大学校长。竺可桢在与蔡元培商讨过之后,向蒋介石提出了三个条件:一是财政须源源接济;二是校长有全权,不受党政之干涉;三是时间以半年为限。

在省档案馆馆藏文史资料里,竺可桢的学生陈训慈记载说,竺接到邀请后,也曾犹豫过。他在1936年2月21日与蒋介石见面后,曾有半个月的犹豫踌躇时间。主要原因是他当时担任气象研究所所长一职,对气象领域的研究一片钟爱。如果去当校长,势必减少科研时间。另外,他对当时的高校教育不太看好。

妻子张侠魂曾对陈训慈等几位同学说:“你们的老师说现在政治混乱,书生气的人,校长不易做得好。而我说正因为当今教育情况不好,好人更应出来,才有改进希望。”竺可桢在日记里也提到因为有“振兴浙江省文化教育事业”的考虑,决定出任校长,并在就任后,一再为了学生为了学校延长自己的任期,最后竟在浙大工作了13年。

## 打破成见寻觅名师

竺可桢出任校长后,深知好教授是一所大学的灵魂。于是他四处寻觅名师,且任人唯贤,不带成见。

在浙江省档案馆的文史资料里,曾任浙大生物系教授的谈家桢回忆说,教会学校出身的他,1936年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后,想为发展祖国科学事业而奋斗,希望能到一所国立大学去,扎扎实实搞一些科学教育和研究工作。但当时派系林立,壁垒森严,一个教会学校出身的大学生,想进国立大学任教,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但竺可桢校长就因为胡刚复先生的推荐,给他寄来了聘书,聘他为浙大生物系正教授,每月薪金300元。这样高的职位和优厚的待遇,对一个年仅28岁的回国留学生来说,确实难得。

后来,沪江大学出身的涂长望教授和燕京大学来的谭其骧教授,也被竺可桢聘来浙大,并给以重用。可见,他在聘任教授方面,特别敢冲破壁垒,任人唯贤。在省档案馆的民国档案中,存有多份竺可桢当年聘任教授聘书,可见当初他对人才的渴求。

正因为他这份重用和厚待,许多浙大教授都特别尊重竺可桢,他交待的事,大家都一定办到。曾任浙大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教授回忆说,当年竺可桢让他当很难干的训导长,他是二话不说就答应了。至于补课代课,更是不在话下了。

## 苏步青的日本妻子

在省档案馆馆藏文史资料中,还有竺可桢如何真诚相待聘来的名教授,让他们安心教学和科研的记录。

苏步青回忆说:“竺校长初来浙大时,我和陈建功先生等老教授对他是有看法的。他到浙大来,我想一定有几位国民党大官员的亲戚如张默君、邵元冲等做他的政治背景的。这时,他又带了一大批东南大学的师生来浙大担任院长、系主任和秘书等。因此,我认为他办不好浙大。这个看法一直到抗战开始后,就慢慢地改变了。”

抗战开始,浙大开始西迁,竺校长自然是最忙的人。他要管搬运,管教学,还要奔走各方要经费。

“可是有一天,他对我说,‘你的夫人是日本人,此行一路上都要检查盘问,多么不便。我已经替你在浙江省省长朱家骅那里要来一张他亲笔写的手令,规定沿途军警不得检查盘问。’可见他是多么细心。”苏步青说。

后来,学校迁到了遵义,竺可桢又劝苏步青抓紧把家眷接出来。可当时苏步青没有钱,竺可桢一下子就批给他900块大洋。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巨款。他把家眷迁来后,竺可桢方才放心。



竺可桢

## 梅光迪的抚恤金

1945年,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在贵阳因心脏病去世。浙大校长办公室数次打报告给相关部门,竺可桢也多方奔走,帮他调查并写证明来争取这笔对其子女来说很重要的抚恤金。

在省档案馆馆藏国立浙江大学全宗档案中,还存有竺可桢批复的公函,除了证明梅光迪从民国二十五年(1936年)起到民国三十四年(1945年)都在浙江大学任职外,还特地帮他调查了在南京的任教经历,也做了证明。大意说,梅光迪曾于民国九年(1920年)至十三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及东南大学任西译文学系主任,十三年起又曾代理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,旋即出国至民国二十一年……

为了一位老师的抚恤金,来来回回打报告到抚恤金寄给家属,折腾了几个月,身为一校之长的竺可桢,可谓尽心尽力,对名教授的爱护可见一斑。

不仅对名教授如此,竺可桢对浙大所有员工都一样关心。对有病无法工作者,爱护备至,病员工资仍如数照给。如数学系王福春教授、园艺系赵荣琛教师都患严重肺病,因当时无劳保制度,且在抗战时期生活维艰,亲友也无法长期帮助,竺可桢均准许他们照支原薪,安心静养。

而为了浙大一名退休职员沈念慈的养老金问题,竺可桢也会专门向教育部呈文,为其争取(这份呈文在浙江省档案馆国立浙江大学全宗档案中可查到)。

当时浙大的许多著名教授都是被竺可桢这样请来并留住的,比如王季梁、胡刚复、梅光迪、张其昀、束星北、张荫麟、苏步青、贝时璋……这些人大多性格独特,气度不同,却都对竺可桢佩服帖帖。

## 营救被捕学生

竺可桢除关心学生学业外,因其时政治斗争激烈,遇到学生要受冤枉时,他竭力保护,使学生避免牺牲。在学校里,不因学生派别不同就区别看待,特别保护学生的独立思想。他请费巩任训导长,也是出于对学生的爱护。当时规定训导长须国民党员才有资格,费巩非国民党员而是进步人士,竺可桢冒大不韪,坚决请他担任。

1947年10月,于子三同学被捕后,竺可桢竭力营救,不幸未成。到狱中见到已被杀害的于子三同学的遗体时,竺可桢当场昏晕过去。注射强心针后,才苏醒过来。

为了救护学生,他多次劝说学生不去游行。实在劝服不了,学生出事后他又想方设法利用各方关系保释。在省档案馆所藏浙江大学全宗档案中,有一份竺可桢为争取学生利益而发的公函,是写给地方法院检察处:“本日本校学生召开全体大会商讨于子三出殡事宜是否延期举行时,突有游民六七十人,手持纸旗棍棒冲入校内,猛殴学生,多人受伤。学生奋起抗拒。学生当场扭住游民十人,相应送请贵处侦讯提起公诉……”

而在省档案馆馆藏文史资料中,还有一位浙大的学生邵全声的回忆令人感动。他曾在浙大就读,跟竺可桢很少往来,只是一名普通学生,毕业后先后在云南、重庆教书。后来为营救费巩教授,不幸被捕,关在很隐秘的地方。

竺可桢到处活动加以营救。1945年深秋,他还通过与有关当局洽商,拄着手杖赶到邵全声被关押的地方探望。邵全声回忆说:“竺校长来看望我,真是如见亲人,心中十分激动。但限定的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,竺校长只得离去。我凝望着他穿着棕灰色夹大衣,拿着手杖的背影,渐走渐远,转过围墙,终于看不见他了。”不仅探望学生,竺可桢还屡次把营救邵全声的经过情形写信告诉其父亲,让其安心,前后竟然去了十几封信。

(下转第11版)



好看好玩有知有见。  
“鳗鱼君”是都市快报“漫阅读”周刊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。  
扫描二维码,关注鳗鱼君,可收看更多精彩文章。